

浙江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基础、问题和方向

王心喜

(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2)

【摘要】考古发掘材料表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古人类就一直生活、劳动在浙江境内,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化石和文化遗迹,翻开了浙江历史光辉篇章的第一页。回顾浙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历程,并对一些重要发现或问题作一评估,可为今后深入研究浙江人类早期发展史提供比较切实的帮助。

【关键词】浙江;旧石器时代文化;回顾;展望

【中图分类号】K87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293/Z(2004)01- 0114- 07

—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第一阶段。它起始于人类诞生之日,终止于距今1万年左右,占人类历史的99.9%以上,涵盖地质历史中的上新世晚期和整个更新世。对这一历史阶段从事研究的主要学科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它是以埋藏于地下的实物资料(包括人类制作和使用过的工具与用具、生产与生活的残留物及其场景、伴生的动植物化石等)为对象,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类的起源与演化过程、社会组织结构、文化与技术能力、适应生存特点、区域性文化在时空上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及其相互关系以及人类行为与周围环境关系的一门学科。

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先民们一直生活、劳动在浙江境内,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化石和文化遗迹,翻开了浙江历史光辉篇章的第一页。浙江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乃是探讨浙江史前文化的重大课题之一。本文拟对浙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历程,做一次综合的回顾和科学的总结,并对一些重要发现或问题作一评估,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浙江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开始于1957年。当年,裴文中、邱中郎对杭州洞穴堆积物中第四纪哺乳类化石展开调查,在留下镇采集了一批哺乳动物化石^[1]。

1962年10月至1963年6月,浙江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的黄正维、孟子江、王雪瑜、叶士泓、朱佩璋等人,在调查浙江石炭、二迭纪灰岩区喀斯特地貌时,在建德、衢县等地考察了100多个洞穴,发现了一个含哺乳类化石的地点,并对其中的4个——骆洞、乌龟洞、桑园、葱洞3号作了发掘。除获得丰富的哺乳类化石外,还在乌龟洞中发现了古人牙化石一枚^[2]。

乌龟洞位于建德市李家乡新桥村南西35度约数百米处,地理坐标为北纬29度20分,东经119度05分。洞穴发育于船山灰岩中,洞口朝向南西30度,高约0.6米,宽约4米,高出当地河面约32米,洞深5.2米。有鉴于在本次考察前,村民曾多次发现过动物化石,有人在洞内挖出龙骨(哺乳动物化石),故将该洞作为重点挖掘。

乌龟洞堆积物自上而下为:

(一)棕色粘土,横向过渡为含钙质结核的黏土。钙质结核大多呈姜状。厚0.7米。棕色黏土中的化石,计有:猕猴、犀牛、巨

獐、水牛、黑鹿、猪、熊、犬科、豪猪、啮齿类。

(二)棕褐色粘土及灰烬层,松散,成小团粒状。含有人(Homo sapiens)的牙齿(p2)和介壳。

(三)棕黄色石灰华胶结之燧石碎屑物,坚硬,含介壳。厚 0.3 米。

据分析,乌龟洞洞穴中第四纪哺乳类化石的种类,基本上与华南山洞中常见的化石种类相同,是属于剑齿象——大熊猫动物群;洞穴中堆积物的时代,根据其中所含的化石或动物种类,可分为含有剑齿象——大熊猫动物群的乌龟洞下部堆积为地质时代更新世中晚期,含有人牙、灰烬层的,为晚更新世或全新世,相当于考古学年代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

建德乌龟洞动物群和古人类遗物、遗迹的发现,不仅为浙西地区第四纪地质和哺乳类化石的研究提供了材料,而且还填补了浙江省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及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空白。本次考察发现的人的牙齿化石,现已不知所在。

斗转星移,11年后,为探索浙江旧石器时代的历史,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张森水、韩德芬、戴尔俭、许春华和浙江省博物馆的魏丰、徐玉斌、张明华等人,于 1974 年冬赴乌龟洞考察,继续寻找古人类化石和遗迹、遗物,发现了古人类的牙齿化石 1 枚和多种哺乳动物化石。人们通俗地将这次发现的古人类称为“建德人”^[3]。

祖籍浙江仙居的张森水在 2000 年 9 月 27 日回忆说:原定赴金衢盆地开展野外考察工作,“1974 年 11 月 7 日到金华,武斗频仍,为安全计,次日转建德,…… 11 月 24 日上午,从建德的上新桥公社(今李家乡)出发,徒步北行约一个小时,抵达乌龟洞。此前浙江区队黄正维等已报道过这里曾发现了化石,我们希望能在该地找到更多的材料。”^{[4] (P68)}由于过去多次挖掘,洞内大部分地都被翻掘过,地层次序遭破坏。这次考察发掘,只得在洞内的边缘未被动过的地方进行。

最初的头两天,在洞穴堆积里发现了较多的哺乳动物化石,以及数百件、无人工痕迹的燧石碎屑。正在深感遗憾之时,一位小孩送来一把化石,经鉴定有犀牛和牛等,令人感到意外的其中有一枚人牙。当得知这些化石来自旁边的小支洞时,考察者们希望在那里找到更多有科学价值的标本。既有人化石,就可能有文化遗物。小支洞堆积很简单,大部分裸露着紫红色黏土。及至堆积挖完,既未有发现人化石,更无文化遗物出土,仅有猕猴、最后鬣狗、猪獾、大熊猫、中国犀、水牛、羊、鹿(可能有大小两种)、鹿、猪、剑齿象等 11 种哺乳动物化石,以及龟、鳖等爬行动物化石出土^{[5] (P202—P203)}。

乌龟洞发现的人牙化石,是一枚右上犬齿(编号 PA. 536),发现时稍有破损,经修复,黏土开裂的小块齿冠,除齿冠外侧远端缺一小块外,其他部分保持完好。齿冠唇面有条状沟槽痕迹,可能是啮齿类动物啃咬的。牙根保存不全,被啮齿类动物咬掉一部分,根尖完全缺失,根部呈一斜面。这件齿冠标本的内侧边缘已经磨耗,但齿尖磨耗的程度比柳江人上犬齿稍弱,估计年龄为 30 岁左右。这枚牙齿现齿冠高 11.6 毫米(稍偏低,因有一定磨耗),近中远中径为 8.2 毫米,唇舌径为 9.5 毫米,其粗壮程度大于柳江人犬齿。依柳江人头骨性别鉴定为男性个体,故乌龟洞所发现的人牙也应属男性^[6]。

表 1 人犬齿比较表(单位毫米)

名称 数据	建德人	柳江人		山顶洞人 101 号		现代人
	右上犬齿	右上犬齿	左上犬齿	右上犬齿	左上犬齿	犬 齿
唇 舌 径	9.5	9.1	9.0	8.3	8.6	8.2
近中远中径	8.2	8.3	7.9	7.9	7.8	7.9

从形态上来看,乌龟洞发现的这枚人牙标本与已知国内人类同类牙齿化石对比,有异有同。若与北京猿人比较,可以看出明显

的进步性。北京猿人上犬齿无论齿冠或齿根均粗壮,至尖端处有突然收缩成细尖的现象。这些原始性在建德人右上犬齿是见不到的。若与现代人男性上犬齿比较,不仅齿冠略大,齿根也不像现代人那样纤细而呈圆锥状。若与同属晚期智人的柳江人和山顶洞人的犬齿对比,在形态上十分相像;但比柳江人、山顶洞人和现代人同类牙齿的平均值都要略大一些(见表 1)。因此,把建德人牙归于人类演化中的晚期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阶段(即旧石器时代晚期)是合适的。

与建德人牙化石一并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 11 种之多。从整个哺乳动物组合看,它属于中国南方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其中大多数种类仍在当地生存,少数已不在当地生活,如大熊猫;其中 3 个种已灭绝,它们是剑齿象、中国犀和最后鬣狗。整个动物组合所反映的气候,比现在要热一些,因为鬣狗和象目前生活于热带地区。由于其中有灭绝动物的存在,其下部还另有化石层,故原初发掘并研究这批化石的张森水等人将乌龟洞含人化石层的时代定为晚更新世的最后一阶段,估计其绝对年代不超过距今 5 万年前^{[4] (P70)}。后来,曾请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年代学实验室用上层(即紫红色黏土层)中出土的牛牙做了两个铀系年代测定,年代距今大约在 10 万年前(230Th 年代 10.8 万年或 9.7±0.8 万年;231Pa 9.1 万年或 9.7 万年)^[7]。不过,张森水认为这个数据明显偏老,这个地层不应属于如此早的年代^{[5] (P203)},因为与人牙性质和上下层哺乳动物组合对比不符,所以他建议不用这一测年结果^{[4] (P70)}。由于测定的材料不同,以及测年的方法、技术水平的差别,测得的年代常常有差距,有时甚至差距甚大。建德人牙绝对年代究竟是多少,还可再探讨。建德人牙化石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牙,应是毫无疑问的。

从发现建德人化石的支洞和主洞的堆积看,均未发现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文化遗存或遗迹,如用火遗迹、生产工具等,故不能把该洞穴看作古人居住的遗址,所有化石包括人牙化石在内,都是自然力(包括动物)的作用由洞外搬运至洞内的,或是流水(包括泥石流)搬运的结果。在洞穴中出土的动物化石不一定是当时古人捕杀或食用的残余。

建德乌龟洞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是杭州地区,也是浙江省境内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人化石。这一发现增加了智人化石在中国分布的新情况,揭示了浙江史前文化的端倪,在考古学上有着重大的意义。众多种类的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为研究全球气候变迁、人类生存环境和第四纪哺乳动物,提供了重要材料。

尽管专家学者在建德乌龟洞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对浙江其他地区的古人类及其文化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陷入停滞状态,多年无人问津,直至 26 年后在桐庐发现一枚人类头盖骨化石,才一改这种沉寂局面。

2000 年 5 月,浙江自然博物馆专家获悉,在桐庐县印渚镇延村发现古人类化石,经过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一枚古人类头盖骨化石,并获取此头盖骨化石印模,又从当地村民手中取回近百件动物化石。

据媒体报道,同年 7 月 4 日,化石被送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经专家鉴定,头盖骨碎片和一个下颌骨,为古人类化石,且个体年龄较年轻。包裹头盖骨的钟乳石样品,经南京师范大学铀系法年代测试,获得初步结果,大致年代距今 2 万—1 万年。按文化年代划分,应属旧石器时代晚期^[8]。由于钟乳石在头盖骨表层,顺头盖骨形状发育,头盖骨年代应早于钟乳石年代。由此推测,头盖骨年代也大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但更确切的年代需进一步测试研究。

“桐庐人”头盖骨化石,对于研究浙江乃至中国古人类发展及演进都有重要的意义。

“桐庐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固然可喜,但仍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或遗迹,浙江是全国唯一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空白省。值得庆幸的是,时隔一年,浙江旧石器时代文化考古终于实现了零的突破。

为了进一步探索古人类在浙江境内的活动踪迹,2002 年 10 月 12 日至 11 月 17 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中国晚更新世现代人起源与环境因素研究专项——浙江旧石器考古调查”课题组,在西苕溪流域进行了为期一月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先后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地点 31 处,采集和发掘出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留物 333 件石制品^[9]。但未见哺乳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伴出。

苕溪是浙江省西北部的最主要水系,有东苕溪、西苕溪两大源流。东苕溪源出天目山南麓;西苕溪发源于天目山北麓,流经安吉、长兴、湖州等地,全长 145 公里,流域面积 3310 平方公里。两水于湖州城区西会合,注入太湖,经长江出海,属长江水系。多年前,考古人员曾在西苕溪流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遗迹。结合安徽宁国旧石器的考古情况,课题组张森水认为,浙江太湖流域可能会找到旧石器的人类活动遗址,而且框定在西苕溪中游地区。这是因为上游地区的地势太高,下游则太低,均不利于古人类的生活,也不利于考古发掘,中游则具备良好的条件。

课题组以考察西苕溪中游地区的砖瓦厂为切入口,以砖瓦厂取土断面的地层中得到的石制品,作为判断相对年代的依据。课题组在安吉境内的西苕溪中游的二级阶地取得良好成果,共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的地点 13 处,其中 3 处在地质学家称之为中更新世的网纹红土层中发现了石制品。同时,课题组还考察了西苕溪上游的部分山洞。

在此基础上,扩大工作区域,在长兴县又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的地点 18 处,其中 2 处的石制品有确切地层,1 处世网纹红土层,另 1 处是晚更新世早期的稀网纹紫红色黏土层。

为了解石制品分布的详细层位,考古人员在安吉县溪龙乡溪龙村村西的上马坎遗物地点(野外编号 AP003)进行试掘,不仅在“网纹红土层”和“稀网纹红土层”中找到了石制品,还在层位较高的更新世晚期的后期地层(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中找到可石制品^[9]。在多个层面发现石制品,表明古人类在西苕溪流域一带活动,在时间上有悠久而延续的历史。

相对于长江流域的其他省份,这次浙江的旧石器发现可谓“石破天惊”。据课题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尤玉柱介绍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年代早,证据充分;二是发掘地面积广,规模比较大;三是类型多,品种齐全;四是形体大,重量大,符合当地以采集为主的农作物生活^[10]。

据了解,此次调查共发现石制品 333 件,均属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即人们常称的砾石工业或砾石石器文化。经科学初步鉴定,石制品的原料主要是石英砂岩和砂岩,其次是火成岩类(如花岗岩和凝灰岩等),还有少量的石英、变质泥岩、硅化灰岩和燧石(即火石)等。从石制品的类型来看,重型的远多于轻型的,其主要是砍砸器、石球和锛等常见类型,手斧、手铲也有发现;轻型石器仅刮削器一类,可再分成单刃和两刃等亚型。石器的修理虽都采用的是用石头打击石头的硬锤技术,将坯材打制出刃口,但其加工方法多样,以向背面加工为主,包括了向破裂面、向平面、错向加工、交互打击和复向加工等。从实物看,石器的加工十分粗糙,器型不规则,刃缘曲折,修疤多深宽型,刃口钝者较多。此外,大多数石制品个体粗大,长度超过 80 毫米。

这次考古发现的石器形体大,主要是与北方出土的石器相比较的。一般说来,浙江的旧石器形体要比北方大 1—2 倍,形体大小主要与当时古人类的生活有关。在北方,生活的条件没有南方优越,动物类型的食物是主食,所以古人类使用的工具是以解剖动物尸体用的石器为主,为方便起见,石器的形体较小;而南方植被丰富,古人类在取得植物类食物时要挖、刨、砍,石器也就相对较大了。

课题组专家认为,在西苕溪流域发现古人类化石的可能性很小。北方地区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几乎都有人骨化石出土,但在多雨潮湿的南方就不一样。这里的土壤酸性特别重,人骨化石极易受到腐蚀,很难保存下来。据张森水介绍,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生活在溶洞中,另一种是四处游荡。最近发现的几处旧石器遗址就是人类在游荡中留下的。若能找到固定的溶洞遗址,出土的旧石器器物会更多^[11]。

这次旧石器考古调查取得的突破性成果,不仅填补了浙江旧石器时代文化考古的空白,改写了浙江省旧石器时代只有古人类化石而无旧石器文化遗物地点的历史,也使华夏大地上(包括台湾省和海南省)不再有省级辖区旧石器考古研究的空白区,而且把古人类在浙江省境内劳动、生息的历史提前到距今 10 多万年前,甚至更长。目前还没有绝对年代的测定数据。据课题组成员张森水根据出土石制品的土层推测,初步判定为 12.6 万—78 万年^[12]。调查区内的旧石器分布地点比较密集,说明古人类在此期间活动频繁,AP 003 地点出土石器数量多,种类齐全,应是一处活动复杂、占据时间较长的中心居址;在多个层位发现石制品,表明古人类

在西苕溪流域一带活动,具有悠久而延续的历史。

综上所述,浙江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开始于 1957 年,相继发现了建德人、桐庐人化石、西苕溪古人类及数以百计的石制品。通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我们可以有理由说,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起,在浙江境内就不断有人类在这里生产劳动,繁衍生息,为后来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浙江旧石器考古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以便获得更多的资料,进行深入的综合研究。

(一)一些化石、遗址虽然做了年代测定,但学术界对测出来的年代数据有不同的意见。同时,不同的测年方法所得结果也不尽相同,有些甚至相差甚远。建德乌龟洞人牙化石的年代便是突出的一例。测年技术也需要改进和提高。还有相当多的化石、遗址未做测年工作,或已测年但未见正式报告发表,如桐庐延村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

(二)浙江省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只发现零星几处,工作还比较薄弱,早更新世和晚更新世早期的文化遗物发现甚少,应着重加强调查、研究。浙西山地、金衢盆地北缘及浙北平原南缘的洞穴、河湖阶地是我们考察的重点。建德乌龟洞及其周边地区仍是一个很有继续发掘潜力的地区。进一步调查,选择适当地点进行系统发掘,以期在新的条件下能获得更多的有关信息。开展埋藏学的研究,对探讨建德人类的生产活动和行为方式,都是有益的。有迹象表明,在现代城镇同样会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河南省洛阳市凯旋路东端曾发现 20 多件石制品和古象化石;北京市王府井附近的东方广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现和研究,开创了在我国城市进行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新记录。

在寻找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同时,也很有可能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早期阶段距今都在 7000 年左右,属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段。这时的社会经济已从采集渔猎为主,进入到耜耕农业阶段,原始农业相对比较发达,猪、狗、牛的驯化表明家畜饲养业已经产生,定居生活较为稳定。这说明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在此之前应该还有一个较跨湖桥、河姆渡和马家浜文化为早的相当长的文化发展阶段。参照目前湖南、河南等地发现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情况,这个相当长的前跨湖桥、前河姆渡或前马家浜文化发展阶段,距今可能要达到万年上下^[13]。1989 年在发掘奉化名山后遗址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其北侧山坡上采集到一件用间接剥离法制作的燧石质镞型器。1996 年冬,在余姚崧山遗址第 6—10 层中出土了数百件燧石质的细小石器^[14],有锤击器、刮削器、尖状器、凿型器、斧型器等五大类,其中刮削器数量最多。器型分凹刃、凸刃、平刃等不同形式,长宽比例接近,长宽厚之和极少超过 9 毫米,属直接打击制成的细小石器。细小石器具有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特征,它们的发现表明横贯宁绍平原的奉化江、姚江、曹娥江流域两岸台地及低山区域,即山麓与平原过渡地带存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可能性^[15]。这些地区山体岩性组成复杂,紫砂岩、变质岩多形成低丘,多山间盆地,适宜人类居住。2001 年 2—5 月,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上山遗址的发现,对研究浙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该遗址约在距今 11 400—8 600 年间^[16]。

浙江至今已经发现了相对丰富的古人类化石和古文化遗物,化石人类的时间跨度达到 10 年以上。这些化石所代表的建德人、桐庐人、西苕溪古人类的人群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粗看起来,这个问题似乎很好解决:较早的人群是时代较晚者的祖先。但是实际的历史进程不一定如此简单。在过去长达 10 万年的时间里,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人群能迁移流动,事实上大规模的人群流动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间就发生过许多次。因此要查明建德人、桐庐人和西苕溪古人类之间有没有祖先与后裔的关系,还待搜集足够的具体证据加以周密的论证才行。但目前看来还不行,因为作为中间环节的人类化石毕竟尚未发现。同理,浙江旧石器时代古人类与跨湖桥人、河姆渡人和马家浜人的关系,由于时间差距太大,难以考证有祖裔关系。

(三)在研究人才方面,浙江至今还没有专业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者,当前急需加快培养中、青年研究人才。有关浙江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成果有限,未见专论,即使是单篇简报也寥寥无几。研究工作尚需进一步深入。在石制品的研究工作方面,多数

只限于一般的描述,深入分析、探讨的论文未见。

(四)在浙江旧石器时代文化领域,有不少理论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如文化系统(或传统)问题,与周边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问题,石制品的一些技术、类型的来龙去脉问题,旧石器时代的特点、起源和发展问题,浙江旧石器时代如何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问题等等。

(五)保护好建德人、桐庐人的发现地,乃当务之急。1982年中国与南斯拉夫溶洞科学考察队赴建德考察后,就呼吁保护建德人牙发现地^[17];张森水在2000年也呼吁迁建在乌龟洞洞口的坟墓^[3]。这里我们再三呼吁当地政府尽早将这份珍贵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纳入正轨。保护、保存遗址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展示和合理利用,让人们了解人类自己的历史,善待环境,促进发展与进步。以保护和保存为前提,合理、适度,科学地利用遗址,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也遵循国际上关于遗产保护的准则。桐庐人发现后,当地政府积极保护古人类遗址,开发遗址考古旅游项目就是较好的一例。

三

虽然在已经发表的文章中提出或讨论了一些问题,但可以深入探索的地方和方向还是较多的。从目前的实际出发,以下几点努力方向是可以考虑的:

(一)争取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一般说来,大多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地质、地层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比较简略。孢粉分析是复原古气候环境的重要手段,浙江旧石器时代遗址还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沉积物分析也是还原古气候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浙江也尚未开展这方面的研究。绝对年代的测定工作的重要性众所周知,不少遗址尚未做年代测定工作。即使已经做了一些测年工作的遗址,也还有进一步再做和用其他测年方法来校正的余地。古生物化石的研究,对确定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相对年代,以及探讨人类的生、生活及行为等方面都是重要的。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加强古生物学知识的训练,提高运用动物化石的水平,是很有必要的。另外,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历史研究,单靠个人难于解决,需要考古学、地质学、古人类学、古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古气候、生态环境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们多方努力,协同解决。因此,我们应尽量争取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长期以来,不少学者探讨过北京人生活时期的自然环境,但分歧较大。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织下,有好几个单位参加,对北京人遗址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之一便是参加调查研究的专家学者对北京人时期的生活环境问题达到了共识,北京人是在比较温暖的环境中生活,其间气候有过波动。此后,对元谋遗址、金牛山遗址、巫山大庙龙骨坡遗址、郧县人遗址、和县人遗址等生活环境,都进行过程度不等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二)注重埋藏学的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起,我国学者就对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重要遗址做过适当的分析。从80年代起,开始注重用埋藏学观点来考察发现的重要遗址,并注重遗址类型的分析研究^[18]。在以往的发掘中,埋藏学的研究虽然也一定程度上受到尊重,但还是重视不够,以致好多信息缺失。埋藏学需要推广应用和发展,使遗址保留下来的遗物、遗迹有机地、合理地联系起来,并作出科学的解释,尽可能恢复旧石器时代先民们的生产和生活情景。今后发掘仍需高度重视埋藏学的详细记录与仔细分析研究,而且要长抓不懈。

(三)加强类型学的分析。今后在室内进行研究时,要加强类型学的深入分析。大多数石制品的技术类型分析工作仅做了初步研究,还可进一步深入研究。石制品的技术类型研究需要逐步做到系统化和规范化。石制品的实验研究和微痕观察研究尚未系统地开展,用与发现的标本同样的原料进行实际打片和修整,仿制出石球、石片和石器。这样可以对先民们石制品的制作技术和方法有进一步的了解。开展拼合研究,以求复原打片或修整过程,更好地理解那些石制品的产生同打片、修整方法的关系。使用痕迹的研究需要加强,以进一步检验现行的类型划分同可能的实际用途之间的差距,为复原浙江旧石器时代先民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有益的信息^[19]。另外,石制品的对比研究,尚可深入一步同国内的主要发现对比。在条件具备时,可进一步同国外同时代的或时代接近的石工业做对比。对已有较为详细研究的石制品,还可以用新的观点、新的手段、新的系统来进一步探讨。

(四)在引进外国流行的或正在探索中的方法、手段方面,要解放思想,大胆引进,并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让实践和时间去检验、提高和改进。

上述诸点并非同样、同时进行,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能统筹安排,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相信这些问题将会逐步解决。到那时,对浙江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演化模式的认识,对浙江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系统或传统、技术和类型的来龙去脉,对当时先民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对浙江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继承与交流等诸问题的探讨,必将会得到更合理、更科学的解释和修正。

参考文献:

- [1]裴文中, 邱中郎. 浙江杭州留下洞穴哺乳动物化石[J]. 古脊椎动物学报, 1957, (1).
- [2]黄正维, 孟子江. 浙江哺乳动物化石新产地[J].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64, (1).
- [3]张森水. 张森水的来信[J]. 建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建德文史资料, 2002, (15):292.
- [4]张森水. 遗憾与快慰——忆建德人牙发现始末[A].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浙江省文物局. 文物之邦显辉煌[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 [5]吴新智, 黄慰文, 祁国琴. 中国古人类遗址[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999. 202- 203.
- [6]韩德芬, 张森水. 建德发现的一枚人的犬齿化石及浙江第四纪哺乳动物新资料[J]. 古脊椎动物与人类, 1978, (4).
- [7]陈铁梅. 我国旧石器考古年代学的进展与评述[J]. 考古学报, 1988, (3).
- [8]朱兰英, 陈昌旭. 古人类考古重大发现:找到“建德人”弟弟“桐庐人”[N]. 杭州日报:下午版, 2000- 8- 19(1).
- [9]张森水, 等. 改写浙江无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地点的历史[N]. 中国文物报, 2002- 12- 11(1).
- [10]鲍亚飞. 浙江极可能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骨骼化石[N]. 青年时报, 2002- 11- 16(8).
- [11]程洁. 安吉惊现旧石器时代遗址[N]. 每日商报, 2002- 11- 10(3).
- [12]鲍亚飞. 湖州旧石器遗址石破天惊[N]. 青年时报, 2002- 11- 10(5).
- [13]王心喜. 试论跨湖桥文化[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 2003, (6).
- [14]王海明. 余姚鲒山河姆渡文化遗址[A]. 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年[C].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7. 281.
- [15]刘军. 浙江考古的世纪回顾与展望[J]. 考古, 2001, (10).
- [16]蒋乐平, 郑建明, 芮顺淦, 郑云飞. 浙江浦江县发现距今万年左右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N]. 中国文物报, 2003- 11- 07(1).
- [17]郑祝明. 专家们呼吁保护建德人牙发现地[N]. 杭州日报, 1982- 05- 12(2).

[18]陈淳. 中国猿人[M]. 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 1998. 86.

[19]张之恒, 黄建秋, 吴建民.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69.